

旅游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廖圣美, 王 群

(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 旅游景区与社区的联系日益紧密, 和谐共生成为未来景区与社区发展的目标, 共生空间为景区与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本文系统梳理和分析了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的概念与构成要素、类型与特征、问题与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 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是分别由作为共生单元的景区与社区在某种共生模式下形成的空间体系, 根据空间分布范围可以划分为 4 种类型, 分别为叠置型、包含型、交叠型和分离型. 不同类型共生空间在自然、人文和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类型转变、空间重构、空间融合和空间功能转型等演变过程, 产生利益冲突、生活空间受挤压以及生态环境风险增大等问题. 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路径. 未来研究应着重对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类型进行分析, 识别不同共生空间类型, 深度挖掘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形成的内在机理, 对不同类型共生空间的功能演变趋势和演化机制进行深入探索, 构建多元评价指标体系, 对比分析不同共生空间类型特征, 旨在为景区与社区空间结构优化及共生发展赋予实践价值与指导意义.

[关键词] 旅游景区, 社区, 共生空间, 研究进展, 展望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616(2025)01-0028-10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Symbiotic Space Between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Communities

Liao Shengmei, Wang Qun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communiti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lose,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has become the goal of future development of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communities. Symbiotic space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communit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and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ymbiotic space between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commun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mbiotic space of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communities is a spatial system formed by the symbiotic unit of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communities in a certain symbiotic mode. According to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range,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namely superimposed type, inclusive type, overlapping type and separate typ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human,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different types of symbiotic spaces undergo evolution processes such as type transformation, spatial reconstruction, spatial integration and spatial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resulting in conflicts of interest, squeezed living space and increase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isks. Finally, the optimization path is proposed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ypes of symbiotic space between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communities, identify different symbiotic space types, dig deep into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of symbiotic space between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communities, and conduct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functional evolution trend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of different types of symbiotic space. Constructing multipl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ymbiotic space types aim to give practical valu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spat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symbiotic development of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communities.

Key words: tourist attractions, communities, symbiotic space, research progress, prospect

收稿日期: 2023-10-2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2171239).

通讯作者: 王群,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旅游可持续发展. E-mail: junyang110771@163.com

对社会、经济和自然等要素的地理空间分布进行分析是包括地理学家在内的许多学科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领域^[1]。共生空间最早是由日本学者黑川纪章提出,他将这一概念运用至城市规划发展中,认为 21 世纪的城市共生空间要求历史与未来共生^[2]。此概念被提出后成为各学科领域研究的重点。共生空间源于不同事物在空间上的共生现象,反映事物之间信息交流和能量互换关系。随着事物在空间内的相互影响,探求他们之间的共生发展模式成为研究的重点。共生空间的研究涉及众多学科,如:在计算机领域, Kawamura 等^[3]研究三维共生空间系统内真实空间用户和虚拟角色之间的有效交互;在地理学领域,牟红等^[4]分析大三峡旅游圈层共生空间结构特征;在社会学领域,柳林等^[5]研究犯罪共生空间的类型识别与特征。目前,共生空间已经发展成为众多学科研究的内容。

旅游业作为新兴发展力量,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形态和空间格局,由于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旅游共生得到深化发展。当前研究更多强调旅游地在区内和区际间的共生关系,城市群旅游共生得益于空间联系上的便利性以及旅游资源的互补性和相似性^[6],区域旅游竞合朝着“一体化互惠共生”模式发展^[7]。目前依据旅游资源区位空间研究景区之间的共生较多,但不可忽略的是旅游的发展是离不开社区的,旅游活动是在社区当中展开的,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关系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关于旅游业的 21 世纪议程》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必须保证社区成员,包括妇女和当地人,都能享受旅游所带来的益处,并把居民参与当作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环节^[8]。景区与社区是旅游地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景区与社区的共生发展模式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针对此,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总结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类型,探讨不同类型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最后对已有成果进行归纳总结,以期丰富旅游地理学的理论体系,拓展新的视角研究景区与社区共生发展。

1 旅游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的概念与构成要素

1.1 概念界定

旅游景区是旅游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地方,可以是自然形成也可以是人为产生的^[9]。景区是供游客游览的空间环境,向旅游者提供观赏娱乐产品,服务设施是景区构成要素之一^[10-12]。旅游景区可以定义为:具有旅游吸引物,有明确的区域场所满足旅游者旅游需求,有统一的管理机构并提供服务设施的地域空间。目前旅游景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景区空间功能^[13]、景区内旅游产品供给^[14]、智慧旅游景区建设^[15-16]和社区旅游^[17]等。社区是人们基于血缘、地缘和相同价值取向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18],强调以地域为中心、同一地域共同体的社会关系,更加注重社区的功能性和地域性^[19]。2000 年我国政府对社区做出规范性定义,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生体。由此可见,社区必须包括基本单元居民以及地域性和功能性两大特点。

共生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思想家对空间的深入探究,空间研究有了明显转向^[20],学者们开始思考“空间”与“社会”的关系^[21]。“共生空间”最早是由日本学者黑川纪章提出,共生空间可以理解为共生单元在共生环境下按照某种共生模式形成一定关系的空间^[22]。旅游地理学重视共生空间的发展与影响机制,从产业-生态二维共生空间研究人类文明与生态演进^[23];从区域、族群和家庭三个尺度研究云南山地民族族际共生空间的特征以及影响机制^[24];以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为切入点,提出乡村共生空间发展理念^[25];依据交通通达度、旅游经济发展要素和参与主体,研究特色村镇与 A 级景区共生空间协调关系^[26];基于共生理论探讨古镇景区与社区一体化共生发展^[27]。

1.2 构成要素

共生单元是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的主体,也是共生空间内部能量产生和传递的基本单位,共生单元是共生体形成的基本物质条件,共生体随空间的变化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共生特征^[22]。从参与主体分析,景区与社区内部存在多元利益主体,将利益主体作为共生单元,可以探究多主体之间相互依存和共生发展关系^[28-29]。从组成要素分析,景区与社区分别为共生单元,可以探究景区-社区共生关系的形成和演化^[30]。

共生模式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结合的形式和作用的强度,同时也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的物质信息交流和能量交换关系,共生空间模式是从空间维度审视共生关系的具体承载形式,可以分为 3 种,即寄生共生空间、竞争共生空间、合作共生空间,其所对应的本质关系是绞杀、袭夺和互惠^[31]。

共生环境是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因素总和. 政策^[32]、交通^[33]、自然环境^[30]、文化^[34]等对景区与社区共生都会产生影响. 共生三要素通过共生界面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共同反映着系统的动态变化. 共生界面是共生单元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传输的载体, 发挥着中介作用. 不同类型共生空间存在不同的共生界面, 如居民与游客互动构成古镇的共生界面、流域构成自然保护区与社区之间的共生界面.

2 旅游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的类型与特征

2.1 共生空间类型

根据空间维度划分, 景区与社区共有 4 种空间位置关系, 分别为叠置、包含、交叠、分离, 据此将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类型分为 4 种(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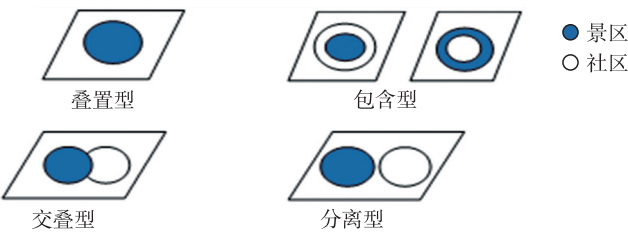


图 1 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类型

Fig. 1 Type of symbiotic space between tourist attraction and community

景区与社区叠置型. 从空间范围来看, 景区与社区在空间上重合, 此类型多存在于古村落^[35]、古镇^[36]、古街区^[37]和旅游小镇^[26]等这类人文资源型景区, 社区即景区, 旅游即生活. 原本的社区有着较好的资源禀赋, 由于旅游的介入, 逐渐转变为景区, 随着旅游的发展, 既承担社区的功能又承担着景区的功能, 景区与社区在空间上融合, 功能、组织、机构等方面就会产生重叠或者交叉, 两者相互作用, 必然产生共生.

景区与社区包含型. 这种空间类型包括两种情形, 一种是景区包含在社区范围内, 另一种是社区包含在景区范围内. 前一种社区占据较大的空间尺度, 诸如城市旅游区^[38]和乡村型旅游社区^[39]等这类游憩景区. 后一种则是景区范围较大覆盖社区, 这类以景中村最为典型, 风景区中包含社区, 如武汉东湖景中村^[40]和杭州西湖风景区龙井村^[41], “景”与“村”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会出现空间上的矛盾, 和谐共生成为景中村发展的目标. 景区与社区在空间上具有包含关系, 其内部在功能、组织上必然也存在共生关系.

景区与社区交叠型. 此类型指的是景区与社区空间范围上具有重合却又存在相互独立的部分, 这种类型较为常见, 自然资源型景区居多, 研究两者共生关系也较为典型. 景区的发展影响社区, 使其空间格局发生变化, 进而导致空间重构和空间再生产现象^[42-43]. 社区内部的权力关系影响着社区与景区旅游空间的关联性, 社区参与度决定居民旅游收益. 旅游使社区空间发生秩序变化, 重塑权力和利益的空间格局^[44], 社区空间的变化必然导致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的差异^[45]. 旅游带来的社会交往活动对社区交往空间也会产生影响, 交往空间的变迁在不同主体间发生, 相互影响相互牵制. 景区与周边社区相互依赖, 在同一区域内存在共生关系, 故景区与社区交叠型共生空间模式的研究也在日益增多.

景区与社区分离型. 此类型指景区与社区互相独立、互相分离的情况, 此时的社区多作为辅助区域依托于景区存在, 两者之间的距离决定着开发的價值, 如旅游从业型社区^[46]多属于此种空间类型. 随着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 为缓解城市居民压力与需求, 乡村旅游兴起, 乡村旅游地大多分布在城市的周边地区, 与城市具有一定的距离, 形成分离型共生空间. 城乡之间距离越近, 越易形成旅游网络; 距离越远, 旅游网络越难形成^[47]. 城市和乡村旅游地是旅游网络中基本要素, 共同推动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

2.2 共生空间特征

2.2.1 运行特征

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的运行特征分为 2 类: 以景区为核心, 社区依托景区发展形成旅游空间网络和以社区为中心, 将社区自然和文化景点转换为旅游吸引物开展社区旅游.

以景区为核心、依托景区形成的旅游空间网络主要以交叠型和分离型居多. 景区具有独特的旅游资源, 地域空间的依附性让社区能够依托景区发展, 社区发展接待服务, 不仅能够缓解旅游景区接待的压力,

同时还能够发挥社区价值,带动社区产业的转型和升级^[48]。景区与社区空间的融合也增强了两者在空间上的联通性和渗透性,社区空间优化,形成多层次、多中心组团的旅游共生空间^[49],使景区与社区朝着一体化共生方向发展。

以社区为中心开展社区旅游主要以叠置型、包含型为主,如古村落、民族村寨等。社区具有良好的自然或人文景观,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旅游潜力,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和空间布局,发展社区旅游,推动景区与社区形成景社一体化共生格局。社区空间是旅游者体验的载体,以其特色空间景观吸引游客。旅游影响传统社区空间变迁,使生产主体发生改变,生产主体从单一变为多元^[50]。随着旅游推动社区发生空间再生产现象,在多元利益主体的推动下,社区在空间层面迸发了新的活力。

2.2.2 演变特征

随着景区的发展、城镇的扩张,共生空间类型会产生改变,其中叠置型与包含型最易发生类型的演变,如古村落、古镇的形成与演化伴随着包含型向叠置型的转变。乡村旅游的兴起与发展,使得具有良好资源的村镇形成社区包含景区共生空间类型,当旅游进一步发展时,整个社区范围都成为景区,形成景区与社区叠置型。交叠型和分离型共生空间因政策或发展等原因也会相互转化。分离型因景区的扩张逐渐与社区产生交叠的部分,从而转变为交叠型。为保护资源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景区需划定明确的边界,与社区分离,交叠型转变为分离型。

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经历着空间重构、空间融合和空间功能转型等过程。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的变化是空间重组的过程^[51],旅游业的介入,使原本生产生活空间逐渐减少,生产空间向旅游主导型转变,生活空间向现代型转变,生态空间承载着主要的旅游资源向多元复合型转变,生产-生活、生态-生产复合新型功能空间增加^[52-54]。空间层次上,在景区发展的推动下社区形成新的空间地域系统^[55],如节日活动塑造新的活动空间,与居民原本生活空间相融合,乡村感成为社区与游客联系的纽带^[56]。通过空间融合可以深化完善交通网络,为旅游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提供有利的条件,社区基础设施逐步得到改善,资金、信息等要素在景区与社区之间实现流动配置。旅游融入生活空间,将其转变为具有生活和休闲双重功能的空间,传统房屋的居住功能逐渐向民宿旅游功能转型^[57],并且承担餐饮、娱乐等旅游服务功能以及建筑、金融等复合型多功能^[58]。通过空间融合,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向着多功能方向发展,更好实现区域旅游利益共生^[59-62]。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承载着旅游和经济社会活动,不同发展阶段共生空间呈现不一样的功能组合特征。土地利用是旅游与社会发展的“空间投影”,对于空间内部功能分异有着直观反映,不同类型共生空间其内部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呈现不同的特点,在旅游的驱动下,朝着功能复合型和服务多元化发展,从传统的“居住+生产”主导逐步向“居住+旅游服务+生产”组合转变,旅居混合布局的用地模式开始分化与重组,休闲娱乐、旅游住宿等专门用地类型和功能空间形成。

3 旅游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的问题与影响因素

3.1 问题分析

3.1.1 利益冲突

利益问题在旅游发展中不可避免,随着景区与社区旅游不断发展,参与主体不断多元化,利益关系纵横交错,矛盾与冲突便由此激化。景区与社区叠置型和包含型共生空间如古村落、古镇、历史街区等,当地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游客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经济利益、社会关系等都是造成各利益主体博弈冲突的关键,从社区居民感知分析景区开发与社区利益冲突,主要包括社区与政府、社区与旅游企业以及社区之间^[63]。由于利益主体需求偏好多元化,可将冲突类型分为:协调型冲突、兼顾型冲突、排除型冲突以及和解型冲突4种类型^[64]。冲突背后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旅游企业不重视或游客不尊重社区居民的民风民俗、生活方式都易产生冲突^[65-66]。景区与社区交叠型和分离型共生空间如风景名胜区,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是其发展的重点,对生态旅游者诉求认识的偏差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生态旅游制度有待完善^[67]。

3.1.2 生活空间受挤压

旅游的发展使社区生活空间逐渐向着多功能方向转变,生活空间不仅仅只承担社区居民的生活功能,同时也承载着游客的旅游休闲功能,居民生活空间受到影响较为明显,如景区与村寨叠合的民族旅游社

区,村民私人生活空间转变为接待游客的旅游公共空间,旅游-生活空间成为旅游社区地方再造的结果^[68]。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流增加,游客与移民的增长对旅游导向型城市的居民日常居住空间同样造成了破坏,历史街区因过度商业化而失去了原有的居住适宜性,同时为了进一步满足游客住宿、餐饮、娱乐等需求,居民居住空间逐步被压缩,趋向集中,产生居民生活空间置换现象,原本的生活空间逐渐变为旅游和商业空间,生活空间置换受到深刻的社会文化影响^[69-70]。

3.1.3 生态环境风险增加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态度对景区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杨桂红^[71]以碧塔海为例研究发现,随着游客人数的增加,拥有直通景区的“南线”发展迅速,“西线”居民收入减少,旅游发展不均衡使居民将怨气发泄在生态环境上,如毁坏生态旅游标牌、乱扔垃圾、乱砍乱伐,对环境进行恶意破坏,对景区环境保护产生不利影响。建立保护区将社区排除在外对生态环境也有着负面作用,如 Mbile 等^[72]以喀麦隆国家公园为例研究发现,保护区的建立影响周边社区居民的生计,资源分配的不均可能使他们恢复到传统生活方式,他们故意破坏景区的资源环境。社区居民有着多重身份,是社区文化的载体,也是景观资源的缔造者,居民对旅游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旅游的开发与旅游可持续发展^[73]。

3.2 影响因素

3.2.1 自然因素

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体系受地形地貌、气候、水体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旅游资源是景区的核心要素,由于资源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自然因素成为景区和社区分布与发展的基础。许斌等^[24]在研究西南边疆山地民族族际共生空间时发现,不同的山地民族基于自然条件和资源的差异会形成以依赖和互助为主的族际共生关系。水源是影响社区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之一,康渊等^[30]在研究青藏高原保护地建设时,通过空间营造分析保护地与乡村社区的共生模式,发现小流域是保护区与社区共生关系的研究重点。地形地貌、水体在空间上的分布,都制约着旅游资源的分布和演化,同时也是影响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的主要自然因素。

3.2.2 人文因素

旅游景区与社区相互作用,旅游的发展离不开社区,景区依托社区发展,与社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社区参与对于景区与社区的共生发展非常重要。Smith^[74]提出“核心区-直接支持区-间接支持区”模型,随着旅游的发展,“核心区”扩展,使得更多的居民进入旅游业。社区参与是地方支持旅游发展的驱动因素之一,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社区参与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社区赋权^[75-76],社区赋权需要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扶持,旅游社区才能真正赋权^[77]。旅游开发促进社区秩序重建,塑造旅游地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有效治理了社区^[78]。同时旅游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内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各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博弈、冲突的过程。在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内,当地政府、社区居民、旅游企业和旅游者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多主体共生行为模式及演化成为分析的重点^[79-80]。景区附近区域开发强度不同,如世界遗产丹霞山,周边包括沿江边缘区,轻度开发区和外围保护带是社区居民、生态旅游者、旅游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协调最为复杂和关键的区域^[81]。因此在对多元利益主体进行协调过程中,应寻求更广泛的利益共同点,合作共生才是有效的治理策略。

3.2.3 社会经济因素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区域内旅游景区空间格局演化。交通事业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交通网络是旅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联系着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交通的通达性直接影响到旅游景区的可进入性以及社区参与旅游的可能性,对旅游景区和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旅游交通是社区开展旅游活动的重要条件,在空间形态和空间组织变迁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张春燕等^[33]在分析薄刀峰林场社区空间演变时发现,社区发生空间转变的根本原因来自旅游发展下的交通区位变迁。景区与社区的基本交通网络决定了两者之间的通达性,便捷的交通是沟通旅游者和目的地的桥梁和纽带^[82],交通通达度驱动景区与社区协同发展。

综上所述,旅游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自然因素制约着旅游资源的分布与演化,是社区分布与发展的基础;社区参与是驱动共生空间演变的内部主导力量,当地政府、社区居民、旅游企业和旅游者等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控制和调节景区与社区发展的方向;交通网络起到重

要的连接作用,影响旅游景区的可进入性以及社区参与旅游的可能性,决定景区与社区之间的通达度。在多重驱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经历了空间重构、空间融合、空间功能转型以及利益协调等一系列转变过程,景区与社区朝着一体化共生方向发展。

4 旅游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的优化路径

4.1 建立、健全利益均衡机制

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所产生的问题以及复杂的影响因素中,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都不可避免,随着资本、权力的进入,参与主体逐渐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诉求各不相同。景区与社区首先要有效协调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培育利益相关者共同价值观,建立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机制^[65]。政府管理部门应明确职责,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保护多元主体的正常利益诉求,尤其是居民的利益分配,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深刻影响着景区的发展。社区居民要积极参与旅游相关培训^[83],维护自身利益,提高旅游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游客要尊重当地文化风俗,与居民和谐相处,从而得到满意的旅游体验。旅游企业要防止过度追求经济利益,以获得其他相关利益者的信任实现共赢。

4.2 优化空间布局与空间结构

随着旅游的发展,社区空间功能从单一功能转向多功能发展,空间的布局 and 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居民生产、生活空间因开始承担游客住宿、餐饮和娱乐等旅游休闲功能逐渐缩小,私人生活空间逐渐转变为接待服务游客的公共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居住空间进一步被压缩。空间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优化空间布局与空间结构有利于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的发展,要重视公共空间的扩展和重建、注重服务功能的提升,让旅游景区与社区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相匹配^[53]。

4.3 完善基础设施,提高空间可达性

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结构受到政府政策、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接待服务水平以及交通区位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交通区位尤为关键,它是旅游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旅游资源禀赋相同的情况下交通区位条件发达的地区能够形成更强的竞争优势,交通区位可达性是分析旅游资源潜力的重要指标。因此景区与社区在发展过程中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目的地可达性,形成优越的交通网络,增强景区与社区之间的空间联系^[82]。推进景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周边的环境治理工作,着重建设好与主干公路的旅游通道对接,使游客可进入性增强,发挥资源的集聚和协同效应,提高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实现景区与社区共生发展。

5 研究述评与展望

5.1 研究述评

(1)社区空间规划与管制是热点,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关系未受重视。旅游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的分布类型是人类社会活动和对自然条件适应的表现,相互之间的作用形式复杂多样。当前研究的重点依旧在社区空间,学者也对旅游对社区地域文化、社会交往、经济发展等产生的驱动作用以及社区空间演变、利益主体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探索。但社区的发展离不开景区,景区与社区空间的交互共生关系缺少深入研究,对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内部结构变化和区域分化关注不足。未来景区与社区向着一体化共生发展,共生空间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2)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类型是重点,不同类型缺少对比分析研究。景区与社区不同类型共生空间内部作用机理和外部影响因素都有所不同,其中,叠置型和包含型多以社区为基础发展旅游,交叠型和分离型多以景区为核心形成旅游网络。利益主体间在不同运行特征下所产生的共生关系也有所差异,叠置型与包含型是多元主体博弈冲突较为典型的空间类型,多元主体互动模式、利益分配、治理机制等在不同类型共生空间下都会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但现有研究未能将不同类型空间产生的冲突与形成的共生模式进行分类对比分析,对不同共生空间类型随发展产生的类型转变、内部空间演化等关注也不足。

(3)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的功能演变趋势缺少深入探索。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的功能呈现多元化演进趋势。现有研究主要从土地利用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旅游介入后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和模式的时空演变特征,揭示共生空间从以“生活+生产”为主导向“生活+生产+旅游休闲”“生活+”等多功能组合演变,阐明

了空间从较为传统的生产生活向不同功能重组与融合的趋势。但景区与社区不同类型共生空间功能的发展与演化也有所不同,现有研究缺乏对类型差异导致的功能演化对比分析,特别是在演化过程中产生的空间冲突与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因此对比分析有利于探究景区与社区空间交互影响程度,对于未来景区与社区空间结构优化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4)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的演化机制分析较为薄弱。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的演进既是对地形地貌、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适应过程,也受到旅游带来的文化、经济活动以及相关政策的强烈影响。现有研究强调了景区旅游的发展对社区空间功能多元化的推动作用,以及社区参与对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影响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的景观和新业态演变以及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研究较为薄弱。交通网络使景区与社区连接成为一个整体,改变了原有的空间结构和形态,形成新的共生空间结构,景区与社区通过协作,推进共生空间的发展与演化,未来可进一步着重研究交通对共生空间演化的作用。

5.2 展望

旅游业正加速回暖,目前呈现供需两旺的状态,社区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依托,随着政府、居民、游客、旅游企业等多元利益主体的涌入,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出现资源要素重新配置、空间功能转型,由此带来利益冲突、生活空间受挤压、生态环境风险增加等问题。面对旅游活动对社区居民生活影响日趋变强,共生空间为景区与社区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借助共生理论,探讨了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形成的内在机理和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通过梳理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的研究进展,探讨当前研究取得的成果与不足,未来应形成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类型的识别和共生模式的定量识别,系统构建共生空间理论体系。具体研究重点内容如下:

(1)形成共生空间类型识别和优化观,建立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分析框架。景区与社区在空间范围上具有不同类型,类型的划定是空间分析的过程,其实质是对共生空间的开发与保护,共生空间的优化遵循一定的原则,是对空间进行合理的设计与安排。现有研究多从景区或社区单方面空间进行研究,如探究某省市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或以社区为中心探究社区参与旅游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较少有研究两者空间交互所形成的不同共生空间类型对景区与社区共生模式的影响。因此,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要重视对空间的分类,未来可结合三生空间与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对共生空间进行合理优化。三生空间能够明确空间利用类型,土地利用多功能性以人为本,以需求理论为基础,其内容契合功能集聚促使共生空间形成的内在逻辑。人地关系是空间规划的起点,景区与社区的共生空间关系是在旅游发展下人地关系在空间上的表现,因此,应重视共生空间的识别与优化。

(2)深度挖掘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形成的内在机理,科学界定共生空间的概念与内涵,深入探讨共生空间理论基础。借鉴目前空间研究成果,结合景区与社区空间特征以及共生理论、人地关系理论等,深度挖掘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形成机理,明晰不同类型共生空间相互作用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学空间分析方法,构建共生空间分析体系。共生空间类型不同,其自然和人文环境均有较大差别,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所形成的共生模式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也各不相同,因此,有针对性地探讨特定类型下或对比不同类型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对丰富景区与社区共生系统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3)挖掘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演变机制,加强对空间问题的研究,以明确共生空间优化方向。结合当地旅游发展现状,揭示共生空间的演化特征,剖析其演变的影响因素和相互关系,探究内部驱动机制。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内包含多元利益主体,利益相关者也是空间产生冲突的原因之一。随着旅游的发展,居民的生活空间受到挤压,生态环境风险增加,明晰共生空间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协调和优化空间的实践指明方向。

(4)构建景区与社区共生空间多元评价体系。共生空间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交互融合形成动态、网络化的复杂空间系统。对于这个复杂空间系统的解析,是景区与社区共生发展的主要研究方向,需要吸纳建筑学、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理论,构建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将旅游可持续发展作为优化的方向。同时,应注重协调和平衡空间产生的问题与冲突,促进共生空间的持续发展。旅游景区与社区不同类型共生空间的功能主导性和功能需求特征各不相同,未来需积极探索空间功能问题与优化路径的实践方法。

[参考文献]

- [1] 赵作权. 地理空间分布整体统计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2009,28(1):1-8.
- [2] 黑川纪章. 共生城市[J]. 建筑学报,2001(4):7-12.
- [3] KAWAMURA T, ABE T, SUGANUMA T. A design of state acquisition function using range image sensor for 3D symbiotic space [C]//2013 IEE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roadband and Wireless Computing, Communication and Applications. Compiegne:IEEE,2013:622-627.
- [4] 牟红,雷子珺. 长江三峡旅游共生空间结构生长与演进研究[J]. 未来与发展,2013,36(12):110-113.
- [5] 柳林,杜方叶,宋广文,等. 犯罪共生空间的类型识别及其特征分析[J]. 地理科学,2018,38(8):1199-1209.
- [6] 苏海洋,陈朝隆. 联系与竞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共生空间若干问题研究[J]. 人文地理,2022,37(4):122-131.
- [7] 潘冬南. 共生理论视角下民族地区区域旅游竞合模式探讨:以广西北部湾为例[J]. 广西民族研究,2016(4):168-173.
- [8] 张广瑞. 关于旅游业的 21 世纪议程(一):实现与环境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J]. 旅游学刊,1998(2):49-53.
- [9] 郭亚军. 旅游景区管理[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 [10] 杨正泰. 新世纪前期旅游业发展预测[J]. 旅游科学,2001(1):17-18.
- [11] 谢彦君. 对旅游产品及相关问题的探讨[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1999(3):70-73.
- [12] 张凌云. 旅游景区景点课程教学的几点体会和设想[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5):40-41.
- [13] VRTIPRAH V, SENTIĆ S. Event in the function of better positioning of tourist destinations:the case study of Dubrovnik[J]. Ekonomika misao i praksa,2018,27(1):267-284.
- [14] AZMI E, CHE ROSE R A, AWANG A, et al. Innovative and competitive: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n new tourism destinations and products for tourism supply[J]. Sustainability,2023,15(2):1187.
- [15] ÇAKAR K. Towards an ICT-led tourism governance: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J]. European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23(34):3404.
- [16] EL ARCHI Y, BENBBA B, NIZAMATDINOVA Z, et al.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alysing smart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contex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urrent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Sustainability,2023,15(6):5086.
- [17] ROCCA L H D, ZIELINSKI S. Community-based tourism, social capital, and governance of post-conflict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the case of Minca, Sierra Nevada de Santa Marta, Colombia[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22,43:100985.
- [18] FERDINAND T, LOOMIS C P. Community and society[M]. New York: Routledge,2017.
- [19] 帕克·迪克逊·戈瓦斯特,沈佳. 城市和“社区”:罗伯特·帕克的都市理论[J]. 都市文化研究,2007(2):146-160.
- [20] FAIST T. The mobility turn: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J].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2013,36(11):1637-1646.
- [21] HENRI L, SMITH D 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Malden: Blackwell Ltd,1991.
- [22] 袁纯清. 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 [23] 张智光. 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共生空间的演化理论[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7):1-8.
- [24] 许斌,卢菁菁,苏朗,等. 西南边疆山地民族族际共生空间研究:基于云南的多尺度实践[J].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20(1):11-26.
- [25] 黄嘉颖,程功. 陕南会峪村共生空间的营建探索[J]. 规划师,2017,33(3):96-101.
- [26] 陈严武,韦福安. 特色村镇与 A 级景区的空间关系及协同发展:以广西为例[J]. 旅游学刊,2020,35(3):113-126.
- [27] YANG D. A study on the symbiosis between tourism scenic spot and 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Shawan Ancient Town[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2016,13(3):22-26.
- [28] 王庆生,张行发,郭静. 基于共生理论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和路径优化研究:以山东省沂南县竹泉村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38(3):108-112.
- [29] 王淑芳. 我国风景名胜区与原居民和谐发展模式探讨[J]. 人文地理,2010,25(3):139-143.
- [30] 康渊,王军. 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与乡村社区共生模式研究:以孟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J]. 中国园林,2019,35(9):83-88.
- [31] 彭翀,顾朝林. 城市化进程下中国城市群空间运行及其机理[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 [32] 周美静,许春晓. 红色旅游共生发育水平测评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以韶山为例[J]. 旅游学刊,2019,34(9):127-144.
- [33] 张春燕,罗静. 旅游驱动下的国有林场社区空间组织演化研究:以大别山区罗田县薄刀峰林场为例[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51(5):700-708.
- [34] 李东晔,周永博,贾文通,等. 基于文化舒适物空间格局的新型城河共生模式研究: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为例[J]. 旅游

- 学刊,2023,38(9):142-155.
- [35] 朱生东. 基于共生理论的古村落遗产旅游整体开发模式研究:以西递为例[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9(4):33-37.
- [36] 郭文,王丽,黄震方. 旅游空间生产及社区居民体验研究:江南水乡周庄古镇案例[J]. 旅游学刊,2012,27(4):28-38.
- [37] 明庆忠,段超.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古镇旅游景观空间重构[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6(1):42-48.
- [38] 吴向宁. 黄石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与城市旅游融合发展探究: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J]. 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21,35(1):35-39.
- [39] 齐天乐. 基于居民视角的乡村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研究:以安徽省颍上县十八里铺花园社区为例[J]. 安徽建筑,2024,31(11):29-31.
- [40] 周阳月,朱霞. “低冲击”视角下景中村和谐共生的规划应对:以武汉东湖景中村为例[J]. 华中建筑,2016,34(2):115-119.
- [41] 李王鸣,高沂琛,王颖,等. 景中村空间和谐发展研究:以杭州西湖风景区龙井村为例[J]. 城市规划,2013,37(8):46-51.
- [42] 陶慧,刘家明,虞虎,等. 旅游城镇化地区的空间重构模式:以马洋溪生态旅游区为例[J]. 地理研究,2017,36(6):1123-1137.
- [43] 孙九霞,周一. 日常生活视野中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研究:基于列斐伏尔与德塞图的理论视角[J]. 地理学报,2014,69(10):1575-1589.
- [44] 景秀艳,TIMOTHY J. 权力关系、社区空间与乡村旅游利益获取:基于福建省泰宁县五个乡村社区的实证研究[J]. 旅游科学,2012,26(5):20-29.
- [45] 尹寿兵,刘云霞. 风景区毗邻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差异及机制研究:以黄山市汤口镇为例[J]. 地理科学,2013,33(4):427-434.
- [46] 乔淑英. 旅游开发背景下海南黎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以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景区、社区访谈透视[J]. 青海民族研究,2017,28(4):86-90.
- [47] 李跃军. 区域旅游中城市与景区空间匹配关系及其优化[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6(3):92-95.
- [48] 施国铃. 景区依托型旅游接待村规划设计研究:以宝山风景区上湖旅游村为例[J]. 福建建筑,2014(6):48-51.
- [49] 王佳,陈冰冰. 基于共生理论的河北省旅游空间结构的优化研究:以唐山、秦皇岛、沧州为例[J]. 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1):123-124.
- [50] 孙九霞,苏静. 旅游影响下传统社区空间变迁的理论探讨: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反思[J]. 旅游学刊,2014,29(5):78-86.
- [51] DREDGE D. Destination place planning and desig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9,26(4):772-791.
- [52] 龙江智,朱鹤. 国土空间规划新时代旅游规划的定位与转型[J]. 自然资源学报,2020,35(7):1541-1555.
- [53] 席建超,王首琨,张瑞英. 旅游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与优化: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J]. 自然资源学报,2016,31(3):425-435.
- [54] 杨周,杨兴柱,朱跃,等. 山地旅游小镇功能转型与重构的时空特征研究:以黄山风景区汤口镇为例[J]. 山地学报,2020,38(1):118-131.
- [55] 朱鹤,刘家明. 山岳型景区建设下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基于云丘山旅游景区微观案例的实证研究[J]. 地理研究,2018,37(12):2490-2502.
- [56] AQUILINO L, HARRIS J, WISE N. A sense of rurality: events, placemaking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a small Welsh tow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21,83:138-145.
- [57] NEPAL S K. Tourism and rural settlements Nepal's Annapurna reg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7,34(4):855-875.
- [58] DAHMS F, MCCOMB J. ‘Counterurbanization’, interaction and functional change in a rural amenity area: a Canadian exampl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1999,15:129-146.
- [59] 杨兴柱,杨周,朱跃. 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以汤口、寨西和山岔为例[J]. 地理研究,2020,39(10):2214-2232.
- [60] 林华山. 海岛旅游小镇规划方法与路径:以东山岛铜陵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例[J]. 规划师,2012,28(2):39-43.
- [61] 黎玉玲. 旅游特色小镇产城空间融合路径初探:以丹凤县竹林关镇为例[J]. 建筑与文化,2019(3):107-109.
- [62] 谭华云,许春晓. 红色旅游区域利益共生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制:基于行动者网络(ANT)的分析视角[J]. 学术论坛,2016,39(11):68-73.
- [63] 柴寿升,龙春风,常会丽. 基于社区居民感知的景区旅游开发与社区利益冲突研究:以崂山风景区为例[J]. 中国海洋

-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62-67.
- [64] 韦复生. 旅游社区居民与利益相关者博弈关系分析:以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为例[J]. 广西民族研究,2007(3):197-205.
- [65] 王兆峰,腾飞.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利益相关者冲突及协调机制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2012,32(1):196-201.
- [66] ZHENG J, BAI X, WU Z, et al.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behavior conflict in suburban village communities based on GPS tracking and cognitive mapping[J]. Journal of Asia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engineering, 2022, 21(6):2605-2620.
- [67] 李星群.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主要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研究:以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J]. 生态经济, 2011(10):141-146.
- [68] 桂榕,吕宛青. 旅游-生活空间与民族文化的旅游化保护:以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J]. 广西民族研究,2012(3):188-195.
- [69] 李鑫,张晓萍. 试论旅游地空间商品化与古镇居民生活空间置换的关系及影响[J]. 旅游研究,2012,4(4):25-31.
- [70] DIAZ-PARRA I, JOVER J. Overtourism, place alienation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insights from the historic centre of Seville, Spain[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1, 29(2/3):158-175.
- [71] 杨桂红. 试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以碧塔海旅游景区为例[J]. 经济问题探索, 2001(11):124-126.
- [72] MBILE P, VABI M, MEBOKA M, et al. Linking management and livelihood i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case of the Korup National Park Camero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5, 76(1):1-13.
- [73] 唐晓云,吴忠军. 农村社区生态旅游开发的居民满意度及其影响:以广西桂林龙脊平安寨为例[J]. 经济地理, 2006(5):879-883.
- [74] SMITH V L. Anthropology and tourism: a science-industry evaluat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0, 7(1):13-33.
- [75] HU F, KONG W, INNES J L, et al. Residents' perceptions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from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USA[J]. Sustainability, 2022, 14(20):13128.
- [76] ZIRITT TREJO G Y, MORENO FREITES Z E, CASTELLANO CARIDAD M I.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formulation of tourism public policy: systematizing your legitimizing process[J]. Jurídicas CUC, 2022, 18(1):497-518.
- [77] 孙九霞. 赋权理论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能力建设[J]. 旅游学刊, 2008(9):22-27.
- [78] FAN H, LI X.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ethnic-minority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Longjing village, Guizhou Province[J]. Sustainability, 2023, 15(4):3187.
- [79] DUARTE ALONSO A, NYANJOM J. Local stakeholders, rol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7, 20(5):480-496.
- [80] 邵利,唐仲霞,向程,等. 旅游社区治理多主体共生行为模式演化探析:以青海省互助土族故土园为例[J]. 湖北农业科学, 2020, 59(24):236-241.
- [81] 黄静波,肖海平,李纯,等. 湘粤赣边界禁止开发区域生态旅游协调发展机制:以世界自然遗产丹霞山为例[J]. 地理学报, 2013, 68(6):839-850.
- [82] 苏建军,孙根年,赵多平. 交通巨变对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及地域类型划分[J]. 旅游学刊, 2012, 27(6):41-51.
- [83] 周慧玲. 旅游共生的研究述评[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4, 30(9):1134-1137.

[责任编辑:丁 蓉]